

●·1960—1967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学习

江时代是受命于64的危难之际，江李都是革命烈士遗孤，颇得邓陈二老厚望，后动荡余波渐消，常委的红色基因不比之前，涛哥时代九长老中，就只有一个曾军师有红色出身，其他家庭皆一般。

不过，如果要矮子里拔将军的话，涛哥时代的还有个吴太师，出身不一般，

因为吴太师仕途深耕上海30年，说的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很多瓜友以为吴太师是上海人，加上吴太师在上海任职时走的是亲民路线，念念不忘上海的“80万只马桶”、“80万只煤球炉”。

其实，吴太师是北京人，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测绘学院的高级教官，他出身大院，吴太师和王朔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北京大院子弟。

吴太师少年和大学岁月，都在北京，直到清华毕业后，他才随工作调动去了上海，并在上海一待30年，成了地地道道的老上海，

●·1967—1976年，上海电子管三厂工人、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科长

●·1976—1978年，上海电子管三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厂党委副书记、厂长

- 1978—1979年，上海市电子元件工业公司副经理
- 1979—1981年，上海市电真空器件公司副经理
- 1981—1983年，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副书记
- 1983—1985年，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党委书记

和其他平民出身在文革中被下放的常委不同，出身革命家庭的吴太师受惠于家庭教育，文革时期没受到多少冲击，反而因为在大学期间就“积极要求进步”，仕途起步很快，去了上海后从专业对口的岗位干起，在那个大学生是个宝的时代中，历任科长、厂长、副经理、局副书记，上海常委，快速的爬升。

●·1985—1991年，上海市委副书记

吴太师人生的飞跃，源于当时的干部年轻化。

揭秘：邓小平如何在上海提拔年轻干部吴邦国黄菊

时政新闻 | 澎湃 2014-08-16 16:55 | 我要分享



“在邓小平关于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的影响下，首先在中央顺利地实现了干部的新老交替。但是，就全国范围而言，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79年前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虽然也都提拔了一两名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但是，当时全国一个省市的党委往往有十五六个、十七八个，甚至更多。年轻干部的名字总是排在尾巴上，充当摆设和陪衬。其中，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更引起了邓小平极大

的关注。

1979年，邓小平专门来到了上海开宗明义地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培养和选拔接班人这一个全国普遍存在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作为在邓小平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领导干部中的一员，黄菊每当提到邓小平对上海领导班子的关心时，总是感慨万千。他说，1983年上海调整市级领导班子，当时的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挑选了18个人，他也是其中之一。他们这批人当时都是四五十岁左右。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比年龄最小的邦国同志大了31岁，比我大了28岁，可以算是我们的父辈。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逐渐培养我们。”

邓太宗之所以找上海做第一个干部四化的试点，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明面上的。上海有突出的经济地位和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作为地方最大的诸侯，上海成功试点干部年轻化，无疑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

第二是暗地里的。如之前的《上海帮往事》所述，改革初期，保守派和改革派互不想让，上海长期被华东系统把持，而保守派大佬陈云正是华东系统的精神符号，所以和大家想象的不同，上海在改革初期，或者说华东系统，对改开态度一直很不坚定。

那时候的上海书记，是有"上海老大"之称的陈国栋，陈国栋就只听陈云的话，对邓搞改革开放那一套不感冒。

上海作为最大的诸侯，上海班子却对改开抵触不合作，这无疑加大了邓的难处，为此，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上海试点干部年轻化的冠冕堂皇理由，来对上海大换血，暗地里实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政策。

邓的想法很直接：

“老一辈人思想保守，不想改革，年龄大升官的空间动力也没了，懒得改革，那我就多用年轻人，年轻人思想开化不保守，而且为了上位更愿意做事”

作为保守派的重要阵地上海，就成了邓第一个重点试点干部年轻化的选择。

而后面上海的发展也的确如邓所料。

吴太师是陈国栋一手提拔起来的，虽然陈国栋很保守，只听陈云的，但他的嫡系吴太师，对改开却没有那么抵触。

最简单的表现，当时为改开事业呐喊的笔杆子，上海"皇甫平"成员之一的《解放日报》总编辑周瑞金，曾撰文回忆：“（皇甫平）得到了当时主持上海工作的吴邦国的有力支持。”

换了年轻人后，听话多了，如邓所料。

年轻的吴太师，就这样趁着东风，顺利成为上海市委副书记。

●·1991—1992年，上海市委书记

●·1992—1994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上海是龙头诸侯，是经济重心，是国企经济的堡垒，上海对改革开放能否推广到全国有着决定成败的全局意义。

所以，邓对上海很用心，除了亲自监督上海干部年轻化外，邓还对上海做了两

大设计。

第一大设计，不断空降外来干部。

第二大设计，不断去上海过春节，利用自身影响力推动上海改开。

先说第一点。

文革时期，上海是四人帮的大本营，改开初期，上海是保守派的大本营，上海的政治问题十分复杂，对全国形势牵一发动全身。为此，改开初期，邓也好，耀邦也好，对上海班子十分关注。

首先，就是将芮杏文置于江同志之上，空降芮杏文市委书记，华东系统出身的江同志为上海市长。

要知道，江不论是从政治履历还是从和华东系统的渊源来看，都比芮杏文强，耀邦偏偏要与华东系基本没交往的芮杏文强压江同志一头，不是出于对江的打压，而是出于对上海班子的不信任。

中央担心上海山头化，特意掺沙子。

后来芮杏文在上海被排挤的待不下去，根本镇不住上海干部，只待了2年，就主动向中央申请上调，灰溜溜的跑了。

1985年6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1987年11月至1989年6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外来户芮杏文走了，上海干部大喜过望，被强压一头老江也终于转一把手，出任上海书记。

然而中央不死心，继续掺沙子，不让上海干部接上海市长，专门安排助溶剂去

上海当市长。

这下上海干部傻眼了，好不容及把芮杏文给挤走，又来了一个外人，而且这个外人还曾被打成右派。上海是保守派的大本营，怎么能接受右派做市长呢，当时上海干部疯传一句话，叫“**中央怎么给我们派了个右派市长？**”

助溶剂也知道上海水深，知道芮杏文的遭遇，因此心里颇不安。

还好，这次中央吸取了芮杏文滑铁卢的教训，知道不给根基浅薄的助溶剂一点东西，助溶剂去上海肯定镇不住场子，到时又要被挤走，于是由赵紫阳提议邓长老首肯，给了助溶剂一个尚方宝剑，**财政包干的自主政策**。

有了财政包干，就有了利诱上海干部搞改革的资本，也有了自己比以往市长更大的自主权，用当时助溶剂的话说，就是：

“有些同志有无穷的忧虑，为什么不忧虑上海的开放？上海这个状况能吸引外资吗？.....我们上海已经贻误了很多时机，现在已经财政包干了，我们不能再贻误下去了。大家为什么不着急呢？这个国际市场还能等吗？你不赶快抓紧干就进不去了。小平同志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要怕担风险。他担心的是我们犹犹豫豫，过于谨慎，贻误时机。当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很需要紧迫感。”

——《助溶剂上海讲话实录》）

拿着中央给的尚方宝剑加上自己的出色能力，既是外来户又是右派市长的助溶剂，总算在上海站住了脚，将上海改开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还偏保守的上海干部里，也许是吴太师大院子弟，对中央精神更能领会，在中央眼里更是大体。

他曾对上海本土干部公开说，**“上海官员在沪讲北京话，与北京保持一致，**

在北京讲上海话，向中央反映地方工作的困难”，努力消解中央和上海的央地矛盾。

还曾在1992年接受采访时这样识大体的表态：

"上海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在中央的领导下进行，而中央也能充份放权给上海，可以说没有中央的支持，就没有上海的今天的局面。所以我们目前的方针是该上缴的税一分都不能少，其次是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第二是服从国家的统合调整。

例如一九九一年华东地区的水灾，要求上海炸坝，而炸坝的结果可能导致上海本身的严重损失，我们还是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办，毕竟中央还有全盘因素的考虑。"

大院子弟北京出身的吴太师，可以说是既是上海帮，又懂北京心，有威望稳得住上海干部，又十分识大体，这无疑给邓陈二老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谈个轶事：

邓多次来上海，一次去上海百货看了，他来到文具柜台前买了东西。



邓转过头问警卫秘书：“你们带钱了吗？”

警卫秘书都说没带，女儿邓楠也说没带……

家人和工作人员没一个带钱的，一时大家傻眼了。

就为难之时，站在一旁的吴太师说：“我这里有”。

邓有点尴尬的说：“那就先借点吧。”

吴太师边说边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十元钱，递给了邓。邓接过钱并没有马上给售货员，他看着钱感慨地说：“我都几十年没拿钱了，还是1954年出样币的时候我拿着看过，今天总算亲手花钱了。”

吴太师借给邓的那十块钱，不知邓有没有还。

不过就算邓要还钱，吴太师也肯定不敢收的。

但最终，邓还了吴太师一个厚礼。

是的，随着兼任书记市长的助溶剂意外上调国务院，上海同时空出了书委书记和市长，在中央的提议和邓的首肯下，吴太师和菊花顺利接班填坑。

这次，鉴于上海班子的良好表现，对改开的支持，中央没有再向上海空投外来干部。

至此，上海本土干部一片欢腾，“终于都是自己人了”

这几节是重点

- 1994—1995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 1995—199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1997—1998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 1998—1999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
- 1999—200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企业工委书记

吴太师只当了上海书记三年，就匆匆上调北京，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江同志想快速抢位置，充实自己人马，实际上，江同志冒着党内很大的舆论反弹也执意要吴太师来中央，除了捞位置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我们回味钱穆的那句话：“君权与相权、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中国两千年政治历史的两大主线关系”

如果是之间中央几次向上海掺沙子是央地关系的范畴，那吴太师上调京师，就属于君权相权的范畴。

江同志刚登大宝，位置不稳，他和李月月鸟搭班子，资历出身皆不如月月鸟，在中央的势力也是月月鸟深厚，就是在8864事件上，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的也不是江，而是月月鸟，他有月月鸟的羁绊。往前看，随着助溶剂的北上中央，以及邓对助溶剂“这个人才我们发现晚了”的评语，下一任总理很大可能是朱。而江和朱搭档多年，十分清楚朱的能力与个人魅力。

往下看，有月月鸟，往前看，有助溶剂，两人都处丞相之位，对江掣肘颇大。

江同志再往上看，还有老家伙们，他们特别是邓老人，也对江不放心。

在江同志之前，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是不入常委的，在江当总书记之后，也就是第七届国务院月月鸟内阁开始，邓让排名第一的常务副总理入常。

常务副总理从不入常到入常，看起来是元老们加强国务院话语权的设定，实际上，江同志没来，国务院就一个常委票数，江同志一来，国务院就有两个常委票数，而当时的常务副总理是姚依林，因工作关系和直接隶属关系，自然更倾向于总理而不是总书记，给了常务副总理一个常委票权，就相当于无形中加强了相权。

而加强相权，就等于变相的削弱君权……

邓让常务副总入常的决定，初始动机是加强相权，看紧他不信任的江同志，

但这一步对后世的影响，和十二大上废除党副主席的决定一样，十分深远……

好吧，不管是往下看还是往前看还是往上看，江同志都要拿出行动来，维护自己不稳固的位置。

于是，我们看到，江同志仿效建国初期毛主席的五马进京，搞了“两马进京”。

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上，正是宣布第三代领导集体独自理政，邓陈长老逐渐退出垂帘听政，四中全会后，江第一次行使人事决定权不用再向元老们请示决定，他迫不及待的将吴太师调到北京。

当然，为了抵消舆论，为了好看些，为了不让人说他心里只有上海干部，江没有独自调吴一人，而是让上海吴太师和山东姜春云一起调进中央书记处。

很快，吴太师和姜春云就都增补为副总理，一个分管国务院的工业，一个分管国务院的农业，再加上事先对外贸易这一大块都是李兰清负责，因此，常务副总理的助溶剂只剩下财政、金融这一块了。

李兰清也是江的人马，他当时还只是对外经贸部的副部长时，一次搬家，让已经是中南海之主的江亲自去恭贺乔迁，后来在国务院，李和朱关系极其恶化，曾在公开场合见面而不寒暄握手，两人彼此冷冰冰的态度下面的人看愣了。

面对吴、李、姜三人的包夹，助溶剂被极大的限制了。

而且吴太师管的工业口子，之前还是邹家华管的，邹家华既是月月鸟在莫期科留学时期的同班同学，又是他在国务院的长期搭档，而且两人都是红色后代，邹家华和月月鸟关系密切，不用多说。

吴太师一来，江一石二鸟。

然而可惜的是，李兰清推动了医疗市场化、教育市场化，吴太师八年多副总理搞的国企改革也弊端丛生。

在这里为助溶剂说句实事求是的话，很多人都骂助溶剂，因此他的种种改革。

然而，实际上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的主要推动者是李兰清，国企改革多年、加深顽疾是是邹家华和吴太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企这块，助溶剂是最后接的烂摊子。

1995—199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1997—1998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1998—1999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

1999—2002年，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企业工委书记

2002—200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企业工委书记

当然，国企改革的主要责任，还是助溶剂背的，因为到底是他做出了国企员工大下岗的决定。

江对朱一直怕“功高震主”，不管是吴太师还是李兰清还是姜春云，都是用心缜密，然而，君权和相权的内耗，导致了国务院长期拧不到一块去，那届班子无法形成合力，特别是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师几年一换人，最后国企改革越改越死，间接导致了中国那段时期严重的经济问题和下岗潮的民生问题。

这是历史给我们后人的教训——

君相和，才能国家兴

●·2003—2008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 [1]

●·2008—2013年，中央政治局常委（至2012年11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

最后，如江同志所愿，长期和朱尿不到一起去的李兰清晋级常务副，拥有了常委票权，而吴太师则再进一步，晋升常委。

吴那些年，的确不温不火，动静不大，除了他十分赏识的黄奇帆曾因重庆事件求救于他，他出过手外，基本上他都很超然，甚至当年国务院李兰清和助溶剂闹得不可开交时，吴都没有怎么和李一起去针对朱，这也是江觉得他“不堪大用”让他去管人大而不是接常务副的原因。

吴太师很雅致，喜欢书法且善于书法，是党内公认的书法高手，和南方的叶选宁被誉为“南叶北吴”。



退休后颇喜道教，常驻白云观，和道士平辈而交，几乎不问世事矣……

重点小结

如果说上篇贾同志的重点，是引出福建往事，交代清楚改开初期的派系倾轧，

为老大在福建一波三折的经历做背景填充，那么这一篇吴太师的重点，就是他北上京师分权朱相，这一点引申到君权和相权的关系史。

闲话九州中，大家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该都有底了，然而另一大政治主线，君权相权，这里初次交代了些。

十二大为何要废除党副主席？国务委员又是怎样的由来？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入常不入常的影响？有小国务院之称的发改委又是怎么兴起的？国务院历史上几次机构改革的成败缘由是什么？小组治国的前世今生是什么？今上与李相的种种过往又是怎样？王73同志是真的主动提出自己不愿当常务副总理吗？

一切的一切的答案，都在君权和相权，这根伏脉千年的主线里……